

1/4 的欧洲人在 2018-2019 年选举中把票投给民粹主义者，20 年前仅有 7%。73 岁高龄的捷克籍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扬·卡万是欧洲政坛常青树，见过太多政治悲喜剧的他说：“从有政客的那一天起，就有了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它赢得选举。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纯粹民粹主义’，甚至在 10 年前都还不存在。”

这一回，民粹主义入侵欧洲的特征很鲜明——排外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DRPX）掌握话语权，包括意大利联盟党、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等，他们当政或参与执政联盟，共同点是反体制特征，自诩为“反对传统精英的人民的完美代表”。然而，它们所代表的“人民”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从消沉的热门行业人群到流离失所的工人，再到失业的年轻人或失去竞争能力的小商贩，而失去职业竞争力和失败者身份认同构成了上述人群不满的轴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社会学家马泰斯·罗德因发现，欧洲民粹党派在抵制全球化上形成共识，他们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全球化代表“零和游戏”，新兴经济体以牺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造成其社会恶化为代价进行强劲增长。他们攻击欧盟推动了快速而不稳定的全球市场，并相信自己将成为这一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但当几十亿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被纳入全球分工方程式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竞争环境中，欧洲变成“被围据点”。不仅如此，在他们的语境里，欧盟财政紧缩政策也不得人心，一方面是负债累累的欧元区国家违心接受条件苛刻的纾困贷款，另一方面是布

鲁塞尔严格的财政纪律，前者主要影响欧盟南方国家，北方债权国攫取大量信贷抵押品，以期收回贷款，可不顾及债务国的民生（特别是就业岗位消失）；后者影响到了联盟所有成员，为了不超过联盟内部商定的 3% 的最高财政赤字，各国不得不对其公共支出大力收紧，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受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最大。

与反全球化相呼应，DRPX 加紧排外，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焦虑时期，对‘我们’和‘他们’加以区别，比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简单得多。”DRPX 所鼓吹的排外与反对欧盟其实是“一卡双带”，首先，欧盟组织持续东扩，带来了人员在联盟内部自由流动，大批中东欧劳工进入西欧，带来中低端就业市场巨变（像英法果园采摘业基本被波兰、罗马尼亚农业工人垄断）；其次，欧洲盲目追随美国武力介入“阿拉伯之春”风暴，导致数百万逃离中东和北非难民的到来，欧盟不得不实施难民配额制度，迫使成员国开放。

香港龙洲经讯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师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嘲笑 DRPX “欺软怕硬”，“把经济困难怪罪到外国人头上，是懦夫行为”。回顾 2008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曾有人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崩溃所引发的民众怒火转到“贪婪的金融寡

头”头上，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失败了，因为金融业可调动巨大资源辩护。况且，拿银行家开刀，不能平息大众怒火，因为打击金融领域并不能提高工资、缩小差距、避免被社会忽视。于是，一通邪火全撒在最脆弱的人群身上，可就是不解决问题。

“班农的阴影”

众所周知，西方选举政治离不开金钱，号称“人民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特别是 DRPX 上台也离不开“金弹”帮衬。日本《选择》月刊报道，跨大西洋之间，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活动经费正流向那些宣扬仇恨思想的民粹主义团体，以至于催生出“仇恨产业”这一名词。最初播下“仇恨种子”的是名叫雷诺·加缪的法国小说家，他在 2010 年前后提出的“大置换”理论引发反响，核心思想是有色人种移民大举涌入，欧洲和美国公民生育率低下，法国人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这一理论迅速在极右翼人士尤其白人至上主义者中引发“大置换热潮”。社交媒体上，有着模特般姣好面庞的美国保守派评论家坎达丝·欧文斯（她自己却是黑人女性）和迈洛·扬诺普洛斯靠着刺耳的极右民粹思想和辛辣的人身攻击，聚拢了超高人气，两人的“中东难民阴谋论”更

在欧洲，如今，借助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欧洲政治市场的入门限制很低，不再需要复杂的组织，抗议运动能迅速聚集起来，新政治组织得以形成，老牌政党被恶意分化。